

蘇軾評傳 (下)

王水照 朱剛 著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

匡亞明 主編

却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離離見吳宮莽莽真楚殿空傳孫郎石無復陶公柳爾來風流人惟

東坡集卷第十二

詩八十九首

游武昌集

連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我來已百日欲濟空搔首坐看鷗鳥沒夢逐崖窟走今朝橫注來一

葦寄衰朽高談破巨浪飛屨輕重草去人曾幾

何絕壁寒溪吼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徐行

欣有得芝朮在蓬莠西上九曲亭衆山皆培樓

却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離離見吳宮莽莽真



南京大學出版社

Critical Biography Series of Chinese Thinkers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SU 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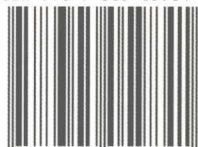
(Book 2)

Wang Shuizhao Zhu Ga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7-305-05984-1



9 787305 05984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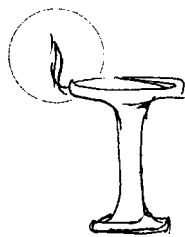
定价：79.00元（上、下）

苏轼评传(下)

王水照 著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苏轼评传 (下)

王水照 朱刚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轼评传/王水照,朱刚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7-305-05984-1

I. 苏… II. ①王…②朱… III. 苏轼(1036~1101)-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6353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苏轼评传

王水照 朱刚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40.25 字数 510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984-1

定价: 79.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任彦申 王国生 王斌泰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任天石 巩本栋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苏轼评传

第四章 立朝大节： 苏轼的政治态度

对于研治中国文史的人来说，苏轼的政治态度可能是最具诱惑力的课题之一。我们在前文中评述他的哲学、史学观点时，也已经触及他对政治的看法，但那毕竟还隔着一层。鉴于他的一生都深深陷在政治漩涡之中（某些超越政治的言论和表现，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而其有关观点的表述又是如此复杂多变，我们不得不对他留下来的论及政治的文章作出细致的、不避烦琐的分析，以寻绎其思路，再参稽当时政界的情形，努力进入具体的历史场景，来把握他的真实态度，并从其学术思想、生平交游等各个方面来作综合的解释。不管怎么说，政治生活对于苏轼，很多时候是比学术著作、文艺创作更重要的；离开了政治，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苏轼。

宋人的政治态度，例可划分为两个时期：“政论”期与“政见”期。这是因为宋代政治家多为学者型，他们在家居读书的少年时代，往往已形成一套对于政治的总体论述，以此应举求售；而当他出仕以后，面对具体的问题、复杂的政局，其政见便不得不有所调整，贤者变得深沉，不肖者则变得投机，多少都会稍变初说。大体而言，前期的政治态度，往往以一系列较具系统的政论来表述，理论程度较高，理想色彩也较浓厚，依据的纯为其“学术”；后期的政治态度，则形于他的具体的政见之中，现实性、针对性必然加强，而促成这政见的因素也便复杂得多。对于一个有理想又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其情形似不得不如此，苏轼亦然。那种认为苏轼政治态度一成不变的观点，是很难被了解史实的人接受的，因为其前后变化可谓显而易见。不过，这里有政客和政治家的判然区分，同样是变化，在政客是投机迎合，在政治家则是在实践中改进发展他的认识。这就要看他有没有那种不惜超越政治、不计个人祸福而敢于真实地直陈己见的人格力量，有了这力量，他才能在不得不扮演的政治角色的掩盖下顽强地凸现出他的政治人格。我们认为，苏轼是具有此种人格力量的政治家，在勇敢地承当了角色的使命后，人格最终脱颖而出——这才是令后人敬仰的。

以故，本章分政论、政见、政治人格三节，来评介苏轼的政治态度。

一、政 论

我们这里讲的苏轼“政论”，是指他实际面对王安石变法这一政治事件以前，所发表过的政治主张。主要的内容是嘉



祐六年(1061年)应制科前完成的《进策》和嘉祐八年在凤翔任上所作的《思治论》^①。写下这些政论时,苏轼才二十几岁,但由于苏洵给了他别人难以比拟的教养,或者也因为他特别颖悟,故尔这些政论已体现出很高的水平,不可轻视。在即将到来的关于“新法”的争论中,比王安石、司马光年轻了二十来岁的他,其议论已能厕于二公之间,不必依人门户。即便是对他颇曾诋抑的王安石,也承认苏轼有自己的“学术”(只是“不正”或与他“素异”罢了),并不是附和着司马光学舌帮腔而已,他甚至还认为苏轼是司马光的谋主,所以尤要认真对付,极力阻止其升迁,而且不择手段迫其离京。从苏轼在王安石心目中的分量,也可以想见苏轼早年的议论已有相当的力度了。

积学深,见理明,议事切,规模远,才会有力度。除了苏洵的影响外,苏轼早年的政论当然也是时代思潮激荡下的产物。仁宗的四十二年“太平”,不但在王安石看来是“积贫积弱”的过程,其吏治的媮懒、财政的濒临破产、禁军的庞大而无用等诸多严重问题,是有目共睹的。与王安石同时,关注着这些问题并思考着改革办法的人并不少,因为自范仲淹、欧阳修振起士风后,一代士人都能感受迫切的忧患和改造政治的责任了。这种忧患感和责任感,在那些后来反对“新法”的官员如司马光的身上,曾经表现得与王安石一样地深切。刘安世回忆说:

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萎靡不

① 《苏轼文集》卷八卷九卷四。



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①

这个回忆大致道出了实情，但出于旧党的立场，说得有点轻描淡写的味道。实际上，士大夫中间要求革新政治、洗刷弊端的呼声，自范仲淹以来是弥漫着朝野上下的。到仁宗末、神宗初，可说是群情激昂，王安石和司马光无疑都处在这样的时代性的激昂之中，甚至他们关于“新法”的争论，也是这激昂的产物。苏轼虽比他们年轻得多，但也面对着同样的社会问题，受着时代思潮的激荡，在政治责任感的驱迫下写出他的政论。

《进策》是一组很系统地阐述苏轼的治国之策的政论文，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共二十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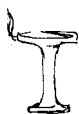
《策略》五篇具有总论的性质。第一篇开宗明义，云“天下治乱，皆有常势”，政治运行有规律可循，治天下有术，救弊有方，可以讲求。然后指出方今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其所谓“可忧”者，大致是民生不安、财用不足、上下不通、边患不息四端。最后揭出论旨：“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这里表明了他的基本的政治态度，是要求振刷，有所树立，虽未明确要求“变法”，但已寓更新之意，与王安石的见解相去不甚远。第二篇是讲如何对付外患，认为不须君主与整个朝廷来为之忧虑，主张专任一个方面大员就可以了。这个主张是不会被宋帝接受的，因为它与“祖宗家法”的集权意旨相背，但苏轼本人则一直认为“内重外轻”过甚也是莫大的弊端。外患既讲过，此后三篇便针对

^① 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记刘安世语，《丛书集成》收王崇庆《元城语录解》本。



内政而发。第三篇最值得关注,通论内政之弊有二,曰立法之弊与任人之失,而苏轼认定当今之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故他主张,法不须大变,要有所树立的话,应该在“用人”上讲求。这就跟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产生了明显的分歧。第四、第五篇接着讲“用人”之术,主张“开功名之门”,来激励天下士气,使天下常处于运作之中,然后可以通达上下之情,深结天下人士之心,以使社会根本牢固。这里又强调了运作、行动的必要性,与因循守旧、苟且拖延异趣,但从“用人”入手,不自“变法”入手。“用人”当然也要求振刷更新,更新而不“变法”,不免有点难解。“用人”而更新旧法,与“变法”而作新斯人,两者之间,可能仅仅成为表述上的差异,也可能成为绝然对立的主张,苏、王二人的同异、得失,于此可窥。

《策别》十七篇,是针对《策略一》中指出的民生不安、财用不足、上下不通、边患不息这四大弊端,而开列的救治措施,即《课百官》六篇、《安万民》六篇、《厚货财》二篇与《训兵旅》三篇。很明显,《课百官》是针对着上下不通之弊,《安万民》针对着民生不安之弊,《厚货财》与《训兵旅》则针对着财用不足、边患不息之弊。我们知道,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关注的主要是财与兵两项,而苏轼则将吏治、民生问题放在主要地位,将财与兵放在后面,篇幅上亦比前两项少得多。不过,《进策》的第三部分《策断》三篇是专讲用兵问题的,三苏本擅长言兵,而言兵当包括训练军队与对外(辽、西夏)作战两方面,《训兵旅》只讲前一个方面,属于内政的,故包含在《策别》里,后一方面是对外患而发,故另作《策断》以论之。这样,虽然他在概括当时大患时也醒目地把“财之不丰”列在“兵之不彊、吏之不择”之前,但总体来看,论财方面特显单薄。仅有的《厚货财》二篇,



一篇讲“省费用”，一篇讲“定军制”，而“省费用”主要是削减冗官冗费，“定军制”的内容包括：反对禁军聚集坐食，取消征戍徒费，用土兵渐代禁军。如此，前一篇可归属于吏治问题，后一篇又实是对军队而言，真正探索经济规律的却空无所有。当然，治吏治军都不失为节省财政开支的重要途径。但《进策》确实缺乏对当代经济运行的新颖论述，更未涉及对于商品经济的初步研究，也不曾提出切中时弊的具体的财经政策。据此，我们只能认为，此时的苏轼并不善于论财，与王安石脑中正在不断成熟起来的新的经济思想相比，高下判然。我们对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并不一概肯定，但苏轼在这方面却还没有起步，谈不上有何高见。后来围绕“新法”展开争论时，却主要围绕着财经问题，当苏轼反对“新法”时，他对于“新法”的经济学内涵未必即有深切的了解。故从苏轼个人认识发展过程看，他反对“新法”是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的，当他从社会风俗、官僚制度、民情好恶等各方面出发来批判“新法”时，经济方面谈不出太多的卓见。

《课百官》六篇是讲吏治问题。宋代集权政治是靠一套官僚体系来实现的，因为要贯彻集权的目的，便要使官僚体系内部互相牵掣，令任何一个主管部门不得擅权，这样就造成设官复沓，吏员冗杂的局面。然后，官员们又养成照章办事的习性，但求无过，不敢有所作为。于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在耗费巨额俸禄之余，又愈益显出腐败、拖拉的弊端，几无效率可言。而北宋中期兴起的改革思潮，也首先要求整顿吏治。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其政纲见于《答手诏条陈十事》^①，前四事

^① 《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四部丛刊》本。



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皆针对吏治而发。苏轼将《课百官》列在《策别》之首，显然也是继承了前辈的改革思想。他对于吏治问题，提出了六点主张：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专任使、无责难、无沮善。这里以“厉法禁”为首，可见他也并不太忽视法制，虽然他认为“用人”比法制更为根本，但在“用人”之术上，则首先强调“用法”，并且要求“用法始于贵戚大臣”^①，故他后来对“新法”中“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等限制贵戚大臣之特权的措施，是深表赞同的^②。从以法治吏的思想出发，他力图建设一支在皇权领导下事有所主、上下交通、反馈快速、富有效率的官僚队伍，故以“抑侥幸”来裁汰冗官，以“决壅蔽”来排除障碍，以“专任使”来提高办事效率，以“无责难”、“无沮善”来鼓励官员有所作为的积极性。按照他的理想，行政体系犹如人身，皇帝和官员之间，应如心与手足的关系，自然协调，这才是有“道”。

民为邦本，故《课百官》后继以《安万民》，其术亦有六点，曰敦教化、劝亲睦、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去奸民。这里以“敦教化”为首，与他观察历代治乱时重点关注于“风俗”，是同样的思想方法。为此，他认为朝廷财政方面应当有所放松，“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义”，反对“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因为那会使“民日趋于贪”，教化不行，风俗大坏，“臣恐其失之多于得也”^③。后来苏轼批判“新法”时，也依此立说。值得关注的还有“均户口”一点，苏轼认为人民在各

① 苏轼《策别·课百官一》，《苏轼文集》卷八。

② 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同上，卷二十五。

③ 苏轼《策别·安万民一》，《苏轼文集》卷八。



地分布不均,也是地力不尽、财用匮乏的一个原因,所以主张移民于荆、襄、唐、邓、许、汝、陈、蔡等人口稀少的地区,以加强该地区的开发,而士大夫应当带头迁徙。这个主张似未被朝廷采纳,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深远的战略眼光。他所提到的地区,在今河南、湖北两省,是北宋疆域的腹地,后为南宋北防的腰部,其战略意义本十分重要,而此地区的空虚,使赵宋政府的对金战局,在北方失败后即无所凭依,只好远窜东南,宋高宗不敢应宗泽的请求回驾汴京,就是因为对这一地区支撑汴京的力量缺乏信心,在建炎、绍兴之际,此地也确实民生凋敝,“群盗出没于其间”^①之区,待岳飞控制了荆襄局势后,朝廷又加以摧残,自坏长城,故蒙古兵终以攻破襄阳而令赵宋政权一溃不可收拾。我们读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其陈述天下大计,亦关注于荆襄地区,认为此地的强弱关系到赵宋的兴亡,与苏轼可谓英雄之见略同^②。然则,苏轼在北宋时提出此议,而未获施行,实令人扼腕叹息。

《策别》的最后部分《训兵旅》三篇,与《进策》的最后部分《策断》三篇,都是讲军事方面的,前者讲治军之法,后者讲对外作战。不过,苏轼在军事方面最值得关注的见解,却在《策别·厚货财》的第二篇,即“定军制”的主张。“定军制”本为了省费用,但同时也针对着最令北宋人士头疼的禁军问题,那庞大的禁军(最多时达一百四十万人)聚集坐食、轮番更戍,不但耗费巨亿,并且越来越显得养痍自患,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

① 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增订本)。

② 苏辙《御试制策》(即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所对策)中也谈到相同的问题,见《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十二。



为禁军已几无战斗力可言。用巨资养着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则此巨资成为徒费。故“定军制”不仅为节省开支，也为了建设真正有用的军队。苏轼的办法是：“臣愚以为郡县之土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按指禁军）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这里的“土兵”，当指河北的义勇、陕西的弓箭手之类的地方武装，他们是在宋与契丹、党项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实际的战斗经验与真正的战斗实力，远优于坐拥轻肥、不堪一战的禁军。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上皇帝书》也指出：“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①所以，苏氏兄弟主张培训“土兵”，俾其渐趋正规化，以取代无用的禁军。一直到元祐末苏轼赴定州出任边帅时，还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弓箭社的建设上^②，可以说，还在实践着他青年时代的主张。当年，韩琦办完了皇位承接的大事后，出镇河北，也就把组建“义勇”土兵部队作为他后半生的要务，而司马光在边关防守的问题上，也对“义勇”、弓箭社等寄予厚望，为了“义勇”的身上该否刺印一事，还与韩琦激烈争论。可见，以土兵取代禁军这一主张的提出，是有相当现实基础的。一般认为韩琦晚年趋于一切守成的看法，并不正确，他坚持在“义勇”身上刺印，目的当在于使之成为新的职业兵，他如此苦心经营土兵部队，是在用他的切合实际的方法解决禁军问题。他的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使他能够采取这种不与“祖宗家法”明显冲突的方式，来渐渐地消解“祖宗家法”养成的一大弊病，以具

① 苏辙《上皇帝书》，《苏辙集·栾城集》卷二十一。

② 苏轼在定州所上奏议《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苏轼文集》卷三十六。



有战斗力的新军队逐步取代无用的禁军。苏轼可能明白韩琦的意图,他把这个意图表述成了文字。相比之下,同样旨在取代禁军的王安石的保甲法,就显得迂远而无效,因为以保甲取代禁军,乃是用民兵取代职业兵,不管王安石如何陈述保甲的作用,宋神宗依然无法相信他的国家可以在没有正规军的情况下保持安全,结果禁军仍须存在,而保甲徒扰乡村。韩琦、苏轼的办法,是在现有士兵的基础上,建设新的能战的正规军来逐渐替代禁军,很可能是当时切实可行的最佳方案。在韩琦的权力范围内,这个方案也正在实施之中,把它打断的,当然就是王安石的“新法”。韩琦绝非保守无为的庸臣,而是范仲淹以后北宋政坛上最杰出的干才。熙丰变法在排除反对派的障碍时,也把老一辈改革家的经验中有益的因素抛弃了,没有认真思考,别择继承。这是王安石的一个弱点,而比较注意吸取韩琦、欧阳修等前辈的思想遗产,恰恰是苏轼的优点。

以上通过分析《进策》,探讨了苏轼早年政论中的各种主张。总括起来,约有如下四个特色:第一,诸种议论皆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病而发,但详于吏治、民生、军制,而略于财政问题,以为此问题可由前三项的适当处理而自然解决(整顿吏治以省冗官冗费,移民以尽地力,定军制以省兵费),不须特设巧取之法。第二,注意汲取前辈的遗产。如“课百官”,是继承范仲淹的主张;以土兵渐代禁军,是继承韩琦的手段。第三,眼光深远,气魄宏大。如主张专任官员,是有意校正宋代政制“内重外轻”的整体偏向;注意民生先于财、兵,是比专注于财政收入更为根本的政治见解;提出移民于腹地,体现了宏远的战略眼光;而以土兵渐代禁军,实是一种看不见的腾挪转换,气魄非凡。第四,总体的政治倾向是革新的,有为的,而不是

